

從“二王”到“顛素”：賀知章草書精神探索

From Wang Xizhi&Wang Xianzhi to Zhang Xu&Huai

Su:exploration of He Zhizhang's cursive spirits

李珂

Li Ke

山東師範大學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

在草書發展史上，二王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後世如智永、孫過庭等人都是在二王的法度內傳承發展，直至賀知章出現，始為新變。賀知章的草書《孝經》已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二王的規矩，而初見狂野的意味，鮮明地體現了他作為黃冠隱士的浪漫主義風格和“四明狂客”的疏狂豁達。賀知章的草書對後來張旭和懷素狂草書的突破有重要的啟發和引導作用。因此，探索賀知章的草書精神對於研究從二王到顛素的草書發展過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賀知章、草書、二王、張旭、懷素

草書發展自漢興，經“杜度、崔瑗始以妙聞，逮乎伯英，尤擅其美。”行至二王，極草縱之致，至唐代顛素方“模楷精法詳，特為真正”¹。在草書發展史上，二王、顛素無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王羲之完成了章草向今草的改制，並經由王獻之繼承與發展。張旭創立了極富表現力的狂草書，成為後世草書的百代法則。懷素則在張旭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與提煉，最終確立了狂草的法度與地位。在從二王到顛素的草書發展過程中，賀知章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本文即通過這段過程的梳理，結合初盛唐時期的時代背景與賀知章的精神性格，對賀知章的草書精神加以探索。

一、從“二王”到初唐書法

王羲之的草書在其家學與師承關係上皆“祖述張、衛遺法”²，並在因襲中加入了適應其雅逸風格的個性化改造，使得他的草書極為婉轉流貫，實現了多字連帶，為情感的流暢表達提供了基礎，同時用楷書的點畫規律改進了草書的點畫，並簡化其形體，從而完成了章草向今草的改制。王獻之草書繼承父書，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且能“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³，打破形體的界線，強化了草書的再連帶，為狂草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此後的南朝時期，草書的風格化一直在二王的規矩內展開。

至於陳隋間，對王羲之草書的傳承首推隋朝僧智永。智永，生卒年不可考，浙江會稽（今紹興）人，王羲之七世孫。張懷瓘《書斷》評其曰：“師遠祖逸少，歷記專精，攝齊升堂，真、草唯命……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⁴宋《宣

¹ 懷素：《自敘帖》釋文，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778 上。

² 張懷瓘：《書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頁 61 上。

³ 張懷瓘：《書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頁 45 上。

⁴ 張懷瓘：《書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頁 64 上。

和書譜》評價智永“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⁵作為王氏後人與“二王”書風的繼承者，智永的草書也承其血脈，其代表作墨跡本《草書千字文》，與王羲之《蘭亭序》筆法形神皆契而更多厚實之感。雖囿於章法，字字獨立，點畫間卻氣韻飛動而禪意更濃。

唐朝廷續了魏晉時期書法蓬勃發展的態勢，諸體漸趨完備，形成了書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初唐草書在孫過庭（646—690）時期依舊沿循二王風格，同時在書法理論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孫過庭的《書譜》，全面論述歷代運筆之法，文辭優美，草法兼備。雖然篇幅短小精悍，卻“微言奧義，已足見其大凡”⁶。作為對二王技法傳承的展示，《書譜》雖然字字精美，但筆法字形卻顯變化不足，後世評價其與王書體勢相同但格調不高。孫過庭傳世的另一作品，《草書千文》，雖然風格近於《書譜》，但筆法間更多體現了王獻之草書風格，用筆放縱，氣象開闊。孫過庭的草書，從運筆風格與感情流露上都集中體現了初唐時期的崇尚二王之風，米芾《書史》評其曰：“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⁷

草書發展至孫過庭，一直都是在二王的風格內進行傳承與發展，而直到張旭的出現，唐草始為突破。至懷素則以“狂”繼“顛”，融禪入筆，形成了不同於二王風格的狂草書，將草書的表現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張旭狂草書的突破，並非是平地驚雷的新變。在孫過庭與張旭中，有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在對二王草書的傳承中開始雜糅章草，以“縱筆如飛，酌而不竭”⁸的態勢開始了草書創作，在交遊中對張旭產生了直接影響，為後期張旭草書的突變奠定了基礎，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這一重要的人物就是賀知章。

⁵ 《宣和書譜》，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3 冊，頁 295 上。

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三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872。

⁷ 米芾：《書史》，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3 冊，頁 38 上。

⁸ 李嗣真：《九品書人論》，見朱長文《墨池編》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頁 690 上。

二、賀知章草書的“狂”、“隱”精神

賀知章（650—744），初盛唐時期著名詩人、書法家。今人對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他的詩歌作品，尤其是《回鄉偶書》與《詠柳》上，但在唐人眼中，賀知章書法方面的造詣更甚於他在文學領域的成就。賀知章的書法作品，據北宋《宣和書譜》記載，“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二：孝經二，洛陽賦上下二，胡桃帖，上日等帖二，千文五（內一軸不完）。”⁹但流傳至今的只有楷書《龍瑞宮記》摩崖石刻與草書《孝經》墨跡，其余作品皆已散佚。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傳世的草書《孝經》與前人的相關評論中管窺賀知章的草書風格與精神，在初盛唐的宏觀背景下體味賀知章在這一時期草書演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賀知章草書《孝經》的筆法，乃傳承二王今草，並雜糅漢簡與章草的寫法風格，疏密有度，章法井然。運筆行雲流水，點畫各異，字字不同。將其與二王草書和張旭狂草對比，可以看出賀知章的草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二王的規矩，而初見顛狂的意味。

賀知章草書風格的形成，體現了初唐時期社會文化對草書發展的影響。唐太宗對書法的喜愛與對王羲之的推崇極大地促進了初唐時期書法藝術的發展，並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王羲之書法的“書聖”地位。唐太宗曾作《王羲之傳論》，對唐代書法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其中提到“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並著重誇贊他的草書“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¹⁰。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大力推崇與臨摹，得到了歐、虞、褚等文人士大夫的廣泛支持，朝野上下無不傾心于王羲之的書法，同時使得初唐書壇形成了以飄逸、淡雅、俊秀為主導的書風。這種風氣影響了整個唐代書法，對唐代草書

⁹ 《宣和書譜》卷十八，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3 冊，頁 297 上。

¹⁰ 李世民：《王羲之傳贊》，見朱長文《墨池編》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2 冊，頁 756 下。

的發展與創新也產生了重要作用。

同時，唐代科舉制度的盛行，打破了門第的界限，通過一種公開競選的考試制度保證了知識分子在出身起點上的公平。這一制度使唐代社會由中古時代的貴族社會轉變為平民社會，書法世家決定書法風氣的局面得以打破，相應地，草書的地位也就隨之改變。

據《新唐書·選舉誌》載，唐代選舉分文選、武選，分別由吏部和兵部負責。“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¹¹將書法作為選舉制度之一，足可見書法在當時社會的重要地位。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由於當時候選人眾多，吏部難以一一“觀其書、判，察其身、言”，於是出現了僅憑書、判來取人的現象。由於書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考官對判卷的評價，因此，書法水平的優劣實際上成為唐朝科舉考試的重要判斷依據。

唐朝科舉考試的科目包括明經（經義）、進士、明法（法律）、明書（文字）、明算（算學）等科目，其中的“明書”就包括文字學知識與對諸體書法的了解。《新唐書·選舉誌》亦載：“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¹²因此，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科目，書法在唐代擁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以書取仕”的現象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書法的發展。所謂身言書判，筆法適美，雖然這一現象是就正體而言，但對草書的影響也是無需贅言的。

同時，道教的繁榮投射在藝術領域，對草書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唐朝扶植

¹¹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171。

¹²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頁1162。

道教，並封其為國教，通過尊崇道教來自高門第，神化王朝的統治。唐玄宗在位時期，不僅十分重視對道家典籍的整理與修習，親註《老子》，命集賢院學士於三殿內宣講《道德經》，甚至連其治國之道，也多以道家思想為宗。《冊府元龜》記載玄宗“以為道者玄妙之宗，德為教化之本，講諷微旨，稽詳秘文，庶無為而政成，不宰而物應”¹³，從中就體現了他無為的治國思想。道教的繁榮投射到藝術領域，造就了一批悟道、嗜酒的書法家，以其想象奇特的浪漫主義特點，促進了草書的發展。賀知章晚年入道，觀其草書《孝經》，筆意連綿，流走快速，以強烈的主體表現精神突破了法度的約束，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

最後，載體的轉換對草書風氣的轉變也有著直接的作用。草書尺牘自西漢興起，到東漢中晚期一度衰落，又經三國西晉時的調整重新回歸實用，直至東晉南朝。而唐朝之後，由於“以書取仕”的影響，人們對書法的興趣逐漸轉移到各種碑誌、公文上來。大量書寫精良的唐代碑刻不斷被發掘出土，成為這一轉變很好的證明。同時，屏壁書法逐漸流行，書法家開始熱衷於在屏風、影壁這種大尺度的載體上進行創作。這種表現空間的擴大使得書法風格與審美趣味相應地得到改變。溫庭筠《秘書省有賀監知章草題詩筆力適健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有“落筆龍蛇滿壞牆”¹⁴句，《嘉泰會稽誌》載“賀知章……善隸草，常與張旭遊於人間，凡人家廳館好墻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¹⁵，便是這種活動的直接描寫。

賀知章草書風格的形成，除了初唐時期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也是他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尤其是他隱逸精神的體現。賀知章處於初盛唐過渡時期，官場上，權臣李林甫把持朝政，對當朝大臣多有迫害，開元初期開明的士人格局由此不復

¹³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第一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558。

¹⁴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五百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726。

¹⁵ 施宿：《嘉泰會稽誌》，見《中國方誌叢書·華中地方·第五四九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影印清嘉慶十三年刊本），頁6455。

存在，士人們的自我理想與現實社會產生了巨大差距。賀知章為了避李林甫勢焰，於天寶三年辭官歸隱，毅然決然入道修行。這種堅守自己心中之“道”，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汙的觀念，是他為了追求人格的完善和個體精神的升華所做出的選擇，同時也體現了他對自由的無限向往與熱烈追求。這一追求訴諸筆端，便形成了他縱筆如飛、錯落有致、富有節奏感的草書風格，使人觀之可感受其心靈的律動與靈魂的吶喊。

同時，賀知章的草書極其鮮明地體現了他疏狂豁達的性格。作為“飲中八仙”之一，賀知章與大部分瀟灑之士一樣，喜書、嗜酒。杜甫《飲中八仙歌》首句即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詼諧幽默而又生動形象。《新唐書》本傳載其晚年自號“四明狂客”，行事更加放縱怪誕，不受拘束，醉後屬詞，“筆不停書，咸有可觀。”¹⁶正是如此無拘無束、行止隨心的個性，才使得賀知章以書法為載體，恣意的抒發他的個人感受。雖然其作品中仍有二王體式，但是“忘機興發”，已經表現出了顛狂的意味。

賀知章作為書法家，在唐代有著重要的地位。《宣和書譜》評論他“善草隸，當世稱重。”¹⁷他的醉後之作，世人也是競相收藏，以之為寶。在賀知章歸鄉時，群臣曾作《送賀賓客歸越》應制詩數十首相贈，其中李白詩曰：“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¹⁸，盧象詩曰：“青門抗行謝客兒，健筆違羈王獻之”¹⁹，分別將他譽為羲、獻。同時，時人將其與張旭比作張（芝）、索（靖）²⁰，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賀知章在草書書壇中的重要地位。至於後世記載較少、當今學界研究不甚多的情況，應是與其詩文書法作品存

¹⁶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頁 5607。

¹⁷ 《宣和書譜》，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0813 冊，頁 296 下。

¹⁸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一百七十六，頁 1796。

¹⁹ 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卷二，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5 冊，頁 20 下。

²⁰ “賀知章……常與張旭遊於人間……雖古之張、索不如也。”施宿：《嘉泰會稽誌》，見《中國方誌叢書·華中地方·第五四九號》，頁 6455。

世數量較少，且其最高官至從三品正授秘書監（去世後追贈正三品禮部尚書），屬於沒有實權的文職，並突然辭官歸隱，急流勇退，政治地位相對不高有關。

三、從賀知章到“顛張”、“狂素”

1. 與張旭的交遊和影響

張旭(675—約750)與賀知章同為“吳中四士”與“飲中八仙”，且有姻親關係，二人往來甚密，實為忘年之交。張旭性格與賀知章相似，“為人倜儻閑達，卓爾不群”²¹，且一樣嗜酒，醉後狂書更甚於知章。賀知章曾與張旭一起飲酒，醉後便一同在屏障與牆壁上恣意揮灑，隨性草書。由此可見張旭對賀知章的書法有著直接的接受，賀知章的書法風格即在一定程度上對張旭產生了影響。如果說賀知章的草書尚有二王風格的余韻，張旭則是一種完全的突破與顛覆。所謂“稽山賀老昔所傳，又聞能者唯張顛”²²，唯有張旭得到了賀知章草書精髓的真傳。觀張旭的草書，已經將賀知章筆下的顛狂意味完全放大，並加以突破，將牽絲連綿轉化為完整的線條，並熟練運用中鋒筆法，筆鋒內斂，剛勁挺拔，顯現出縱橫捭闔之氣象，如金蛇狂舞卻又不失渾厚之勢。觀其代表作《古詩四帖》，滿紙煙雲，連綿不絕，體現著其獨特的狂草風格。

賀知章除了直接對張旭的草書風格產生影響，還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他的仕途觀與命運觀。因有姻親關係，早年賀知章在張旭的仕途上多有引薦，但當賀知章看清了當時政治黑暗的現實後，便毅然決然選擇告老還鄉，遠離廟堂。天寶三年賀知章辭官歸隱不久病逝，時隔短短兩年，張旭便也退居洛陽，結束了他的為官之路。如果說在交往中張旭受到了賀知章草書技法上的影響，那麼張旭在潛移

²¹ 朱長文：《續書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0812冊，頁734上。

²² 吳融：《贈瞿光上人草書歌》，見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六百八十七，頁7899。

默化中接受的賀知章的仕途觀與命運觀，則使其更加專注於草書對於真性情的表達與闡釋，間接地對張旭狂草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張旭的“揮毫落紙如雲煙”和“李白斗酒詩百篇”與“裴旻將軍舞劍器”並稱為唐代“三絕”，且被後世尊為“草聖”，足可見張旭的草書在唐朝書壇的重要地位。觀張旭草書風格的形成，賀知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懷素對賀知章、張旭草書的發展與創新

懷素（737—799）以“狂”繼“顛”，師法張旭，並對其中鋒筆法進行進一步的提煉與簡化，使其草書線條更加簡約，顯現出如鋼絲般環繞瘦硬的強大表現力。觀其《自敘帖》，下筆狂放卻不失法度，如驚蛇走虺、驟雨旋風，極盡敬側之勢。這種極富浪漫主義的狂草，以極高的藝術表現力和豪放灑脫的新面貌體現了恢宏壯觀的盛唐氣象。張旭與懷素最終確立了狂草書體的法度與地位，這一成就向上追溯，與賀知章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綜上所言，賀知章的草書上承二王今草余韻，並雜糅章草，進行了個性化的改造，使其初具顛狂意韻，為張旭、懷素狂草書的突破奠定了基礎。初唐時期崇尚書法、“以書取仕”的時代背景，和道教的繁榮與屏壁書法的流行等有利條件，都促進了草書的發展與變化。賀知章的草書，鮮明地體現了他作為黃冠隱士的道家浪漫主義風格和“四明狂客”的疏狂豁達的性格，並在一定程度上已越出二王的規矩，而初見顛狂的意味。賀知章對張旭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張旭領會了賀知章的草書精髓，並加以發展與創新，形成了自己的狂草風格；另一方面，張旭受到賀知章仕途觀與命運觀的影響，使其更加專注於草書對於真性情的表達與闡釋。懷素師法張旭並加以發展，最終形成了極富表現力的狂草書體。因而賀知章在二王到顛素的草書發展過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施宿，《嘉泰會稽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 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 呂文明，〈東漢敦煌張氏家族書法文化通考〉，《中國書法》2017年04期（北京：中國書法雜誌社，2017年2月），頁174-179。
- 王志勇，〈唐代狂草初論〉，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5。
- 趙姍姍，〈以張旭懷素的比較研究看唐代狂草書風〉，曲阜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